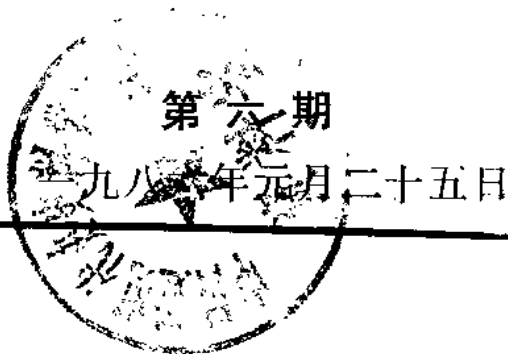


0408

七三二

榆次文史资料

政协榆次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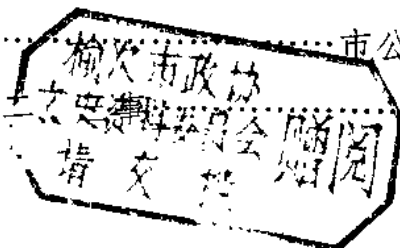
目 录

暴政史实

- 阎锡山在榆次的暴政.....郑景云 (1)
- 附一、兵农合一给郭家堡带来的灾难.....赵有勋 (11)
- 附二、“三自传训”血染榆次教育界.....梁秀梅 (12)
- 附三、榆次农民受盘剥的几例.....陈 模 (15)

烈士小传

- 1、吕子兴同志小传.....市公安局供稿 (17)
- 2、王维则烈士传.....市公安局供稿 (27)
- 3、记冀尔全同志.....郑景云 (34)



口碑记实

智取敌炮楼……………韩培基口述、满致中整理 (37)

生涯回忆

1、曹瑞民率部投奔解放区……………史金和 (40)

2、我起义入伍的前前后后……………师国珍 (47)

金融概况

一九三六年以前榆次的金融业……………赵有勋 (50)

创业始末

1、我是怎样经营北门澡塘的……………杨增喜 (56)

2、茶庄聚兴顺……………郝建九口述、赵子光整理 (59)

民间社火

南庄架火……………赵俊杰、石凡 (65)

名产介绍

榆次部分传统名产……………孟宪诚 (66)

文史信息

榆次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写组名单…………… (70)

阎锡山在榆次的暴政

1. 置民于死地的“兵农合一”

阎锡山抢占太原后，在其称为“收复区”的晋中平川实行了“兵农合一”暴政，1946年1月，阎锡山派出的“解救团”来到榆次，阎世英任团长，任务是开展政权，扩充同志会组织，4月，强令村长、闾长、邻长划定村界，划分“份地”，“编组”抽常备兵为其打内战当炮灰，组织训练国民兵。到六月，正搞抽签当兵，常备兵入营，由于军事上吃紧，榆次县国民兵团来了个直接抓壮丁送晋绥军当兵，各村的一些青年为逃避阎锡山抓兵卖命，宁肯去掉自己的一个食指。

新式封建农奴制的“兵农合一”，就是为了征兵、要粮。榆次从1946年4月至1948年7月，实行了两年多的时间，各村派解救团指导员一人领导，将年龄在18岁至45岁的人编在兵农互助小组中，每组6人，其中一人当常备兵（加入军队上前线，入八总队、保警队。常备兵的名额在年龄18岁至22岁的壮丁中抽拨）；一人为预备兵；四人为国民兵（种上“份地”出摊派粮花。编为民卫军，不脱产的自卫队）。预备兵和国民兵将六人的“份地”种上，负担入营当“常备兵”及其家属的费用，也就是交“份底粮”，“份儿花”（棉花）。而45岁以上和18岁以下的人不给“份地”种，无生活来源。编组的人每人一份“份地”，大多数村庄农民“每人每一份地

交份地粮（小米和小麦）三石，熟花五斤”，共交15石粮25斤熟花，一半为常备兵在营食用，一半“优待”常备兵家属。榆次县在“兵农合一”的二年中共划分份地八千余份，约三十万亩，抓壮丁二千二百多人当了常备兵，民卫军一万多人，征粮、抢粮十七万石，布换粮三千石。

根据1948年10月榆次县指挥部调查对各区村统计，榆次实行兵农合一的村庄共100个，其中二战区统治较长的兵农合一村子87个，经过土改又被阎军占领搞过兵农合一的村子13个。据第八区西聂、鸣谦、使张、王胡、东付、聂店、峪头等23个村兵农合一情况调查，共1483户，9094人，土地86224亩，编了兵农合一小组297个，划“份地”1672份，份地亩数不等，如西付村每份“份地”79亩，鸣谦35亩，西聂村48亩，王胡56亩。1947至1948年，23个村饿死131人，当常备兵、预备兵的有500人，民卫军935人。在负担常备军方西，以南关为例，每人每“份地”交公粮80斤，每组400斤（常备兵食用）优待粮50斤，每组250斤，（供常备兵家属），布换粮10斤，还交预备粮、备战粮、优待花（熟棉）等沉重负担。南关每人分一“份地”，每份45亩，根本种不过来，这些国民兵领的“份地”，大多数没有畜力，不能耕种，又加上每天操练军训，土地荒芜，蓬蒿丛生，当时南关的顺口溜是“兵农合一就是好，荷得茅只（大粪）没人掏，地儿（里）庄稼更是好，不长粮食尽长草”，“兵农合一真不赖，家家都把产业卖”，“要完粮食要棉花，拆了住处修炮台”。摇钱树，聚宝盆，走得站得饿死人，黑房只儿尽捆人，敲诈勒索逼煞人”。在榆次实行兵农合一的农村，都是土地荒凉，臭蒿荆棘满地长着，当时的民谣是：“兵农合一好，遍地是蒿草”，

“兵农合一聚宝盆，又没粮食又没人”，“地里蒿草多，村里病人多，家里女人多”（男的都当兵修炮台去了）。永康村流传着：

“兵农合一聚宝盆，青年当了兵，老汉娃娃填了坑”。

1947年的旱灾，霜冻的天灾加人祸，使农民走向绝境，各村的乡村征粮员如狼似虎向农民逼粮征款，农民无粮可交，又在各乡派“拍卖员”，将农民的房屋家俱卖掉顶征粮款。王都村的拍卖员拆卖庙产两座，农民房子五十多间。西白村拆卖民房一百八十多间，公产房一百二十多间，箱柜衣物、农具、羊儿都被拍卖。在逼粮中，西白村、王都村农民坐过老虎凳的一百多人，陈存堂老汉因坐老虎凳而死。交不了粮的农民受到捆吊、毒打、扣押的不计其数。王都村农民在顺口溜中说到逼粮情景：“四十二天连夜干，好比阎王登了殿，各样刑具都摆全，农民跪下一大片”。1947年，西白村粮食征完后，饿死村民彭友人，杜同绪、常之亨、杜苟蛋、彭合高、李根国六人。王都村逼粮时，杨四蛋没粮，就被诬为“伪装”，逼得他跳井而死。农民寇锦玉将全部家当、盘碟，凡是能卖的全卖了，还欠五斗麦子，不交以“伪装”处理，寇锦玉只好趁黑夜投井西死。永康村民田壮升，没粮交被扣起后，催粮员将他家的炕刨开寻粮，逼得他上吊而死。北要村民陈大武没粮交被吊打而死。各村在要粮中，不仅有乡村干部，还有警察、自卫队，直要到农民家里盆光食光、揭不开锅盖的地步，只是吃豆饼、糠、野菜、树叶。1947年的征粮成了强盗式的抢粮。

阎锡山在榆次推行的“兵农合一”暴政给榆次的农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不论是征兵抓丁，还是搞“份地”要粮抢粮，使农村破产，农民饱受其害和在死亡线上挣扎。

2、惨绝人寰的“三自传训”

阎锡山实行的“三自传训”暴政，“乱棍打人”最为惨绝。

抗日战争胜利时，榆次境内有路东、路西、路北三个抗日县政府，大部分村庄在人民手中，革命形势是好的。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军政势力从晋西南返回太原，占领了榆次县城及铁路沿线的村庄后，疯狂向解放区开展水漫式进攻，抢夺胜利果实，从那时起，在赵俊义斗争区，韩晋材县政权占领区，从城关到各乡，就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罪恶统治和各种残无人道的血腥屠杀，榆次民众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一九四六年四月，阎锡山的榆次县“解救团”成立，阎世英任团长，其任务是，向解放区进攻，抢夺胜利果实，组织同志会，推行“兵农合一”暴政，施行“肃伪”斗争。不久，榆次县保安警察大队（又称爱乡团）配合阎军一个师向路西，四十九师向路北蚕食进攻。秋后，阎军四十九师“水漫”进攻路北，逐步占领了砖井乡、罕山乡、什贴乡，路北榆次县党政军人员撤出榆次，转移寿阳。阎军四十九师第一团团长赵俊义在榆次孟家井、什贴镇一带和寿阳、孟县实行“自清、自卫、自治”血腥统治，阎锡山把“三自”定名为“俊义奋斗法”。九月一日，赵俊义扶植成立起什贴区公所，乡武装自卫大队和村自卫队，另有逃亡地富和流氓兵痞组成的“榆次还乡复仇奋斗团苏家庄连”。这股反动势力和武装，残暴杀害翻身农民和无辜百姓，迫使各村共产党员自首。将山庄头村党支部书记、武委会主任王秃只捉到沅渦，铡死在卧羊沟，杀死苏家庄反奸清算斗争积极分子胡毛儿。枪杀了杨头村翻身农民杨有福。龙白村支书康小四被枪杀在蒜峪。曾在路北县政府当过饮事员的刘小虎，被用

石头打死在蒜峪河滩。李坊村农民韩六蛮说了句“八路军是青天”，就被区便衣带回什贴枪决。北要店村农民赵全福的女儿和我方干部结了婚，赵全福被扣到什贴用乱棍打死。在罕山乡、砖井乡、鸣谦乡、东赵乡、东辅乡被枪杀、活埋、乱棍打死的我方干部、小学教员和群众就有四十三人。一九四六年五月，阎锡山任命韩晋材为榆次县长。一九四六年九月，韩晋材县政府在其占领的村庄挂出了“治村”的牌子，治村设三人小组，包括村特派员、村分队长、治村长、发展同志会员，确定斗争委员，血腥残杀进步民众。在大西门外残杀了段三玉等四人。在小东关刺杀了井峪村农会主席李二娃等四人。在南关三郎庙戏台上，召开南街治村民众复仇除奸动员大会，北田民兵王振华被拉到大西门外枪杀。在南关孟田庙和廊门外乱棍打死了沁县人史柴蛮等三人，并将耳朵割掉。在南赵村杀死南赵民兵队长苏仁锁。南蔺郊自卫队队长成彬志被刺死在彭家庄。柏林头村治安员王海先被枪杀在本村，陈海中的女人（军属）被杀于十里沟河滩。小张义村的张金定（民兵队长）和王守儿（其弟王守勤是共产党员）被枪杀在本村庙后。将张庆村的孙保太（农会干部）用“大慈大悲，笼蒸锅煮”精神被铡刀铡死在戏台边。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榆次县成立三自传训委员会，县长韩晋材任主任委员和县三人小组组长，副主任委员有同志会县分会主任王熙，国民分团副团长吴文山二人，委员有县府秘书主任赵云山，警察局长康希武、特警组长刘彪等十六人。梁化之、续济川到太谷，指示各区：县加紧实行“自白转生斗争”运动，以平遥县长尹遵党的做法为范例，召集徐沟县长邢廷彬，太谷县长阎世英和榆次县长韩晋材开会布置，在韩晋材回榆次时，梁化之对他说：“你们榆次

应早办，召集区、县三人小组研究，年底必须完成”。“作法上要采取群众扣捕，群众执行的方法”。韩晋材回县后，争先推行三自传训，梁化之在平遥坐镇，用电话催促。当月，榆次县三人小组以郭家堡为试点，全县每个乡的全体干部、自卫队、乡斗争委员，由乡特派员、乡队副带领到郭家堡参加“三自传训”受训，并带了各村需要“自白转生”的共二千多人。在住地开小会，东戏园（现文化馆）开大会，时间有一周。将各村提供的“伪装”名单，令其自行捕杀，规定各乡最低数字必须是七人以上，并规定路西永康、王都、怀仁、万春等乡为重点。会后，开展了区与区、村与村的杀人竞赛。王都乡特派员召集乡干部开会，拿着县里的指示信和材料说：

“韩晋材强调咱们乡至少要打死二十人。要保证完成”。就在会上分配干部协同受训回来的人当夜扣捕十四人，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乱棍打死十一人。万春乡乡长王平以杨村为典型，在杨村关帝庙乱棍打死杨村三人。王都乡第二、三次在王都村又乱棍打死八人。怀仁乡在怀仁村打死十一人。西双乡在南要村大寺乱棍打死八人。永康乡先后在永康乱棍打死和枪杀永康村民九人，郝村村民二十一人，西河堡村民七人，北胡乔村民四人。井峪乡乱棍打死四人，铡死一人。东赵乡在东赵乱棍打死三人，在下弋河滩乱棍打死三人。东辅乡乱棍打死五人。使赵乡乱棍打死五人。砖井乡乱棍打死四人，枪杀一人。鸣谦乡枪杀七人。罕山乡枪杀五人。仅郭家堡“三自传训”受训后的七天中，各乡就杀害人民群众九十七人，据一九四七年底阎锡山省政府统计，榆次县被打死和逼死的就达五百四十人。

乱棍打人的惨绝人寰场面，使人心惊胆颤，不忍目睹。如：万春乡乡长王平在杀害张寅卯等三人时，他嚎叫说：“今天我们开的

是肃伪斗争大会，三人都是伪装，给八路军买过洋布、毛巾，今日我们要肃清这些伪装，大家用乱棍从下往上打。“由自卫队”、“斗争委员”、“兵农基干”强迫群众用棍棒，从脚打到头，顿时血流遍地，脑浆四溅而死。演武村共产党员马九斤，被乱棍打的昏死复醒，站起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阎锡山”！壮烈牺牲后，头被铡下，挂在十字街头，并把生殖器也割掉。阎锡山在榆次的这伙鹰犬，还用绳吊、捆，木棍打，打耳光、打手板，钉竹签、坐板凳、踩杠子、火柱烫、肚不脐里扎猪鬃、生殖器里扎猪鬃等极残忍的毒刑，残害民众。永康村许臭小被红火柱烧烫三次，枪决在永康西门外。郝村丁根旺被红火柱烧，红熨铁烫，上竹签，子弹尖钉在肚上，最后被枪杀。张庆村韩变梅，被捏造给村外民兵送过饭，遭到毒打后，被枪杀后，已怀孕九个月的胎儿还在肚子里动弹，又对着肚子打了一枪，母子毙命。

这场杀人竞赛的罪恶活动，一直延续到一九四八年夏初。双手沾满榆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们受到了阎锡山与榆次县长韩晋材的“嘉奖”。如：什贴乡自卫大队长张俊，六十四天杀害六十三人，得到韩晋材的绿旗“奖励”。永康乡乡长夏志明，各村称他是“杀人魔王”，赢得阎锡山“肃伪英雄”称号，并奖给手枪一支，子弹二十粒，“民众日报”登载其为“肃伪第一”。怀仁乡特派员马维新人们称他是“马阎王”。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日，榆次获得解放，榆次最黑暗的一页历史翻过去了，人民才重见天日。解放后，那些在“三自传训”中作恶者都受到了惩罚，人民政府将他们逮捕、镇压。

3 杀人如麻的“特警组”

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提起榆次特警组，真是谈虎色变，触目惊心。在特警组牢房听到那下竹签的惨叫声，迄今想起来仍然令人寒颤。特警组是阎王殿，是人间地狱。

榆次特警组是阎锡山在太原成立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所属的在榆次公开活动的特务机关，指挥着警察、宪兵等部门，进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种种罪恶活动。它权力很大，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扣捕人民，任意审讯毒打并处死。山西这一反动特务组织是以1942年3月设立的侦察组为基础，于1943年6月后在隰县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执行部流动工作队”（流工队），又于1946年3月将流工队改编为“二战区长官部特种警宪指挥处”，1947年取消战区制，又改为“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梁化之任处长。1945年10月派马继阳等五人来榆次成立流工队榆次流工组，驻俞家街34号。1946年3月1日，流工队改“特宪处榆次宣慰组”，赵九银任组长，仍驻俞家街34号。当年7月有特宪队梁化之、徐端参与，将榆次纱厂我地下工作人员谢德润扣捕，接着又扣捕五十余人。

谢德润受刑中双腿被打断，死于太原特宪处监狱。1947年3月1日，榆次宣慰组改称“特宪处榆次特警组”，驻城内东大街28号（现公安汽车队）至1948年7月18日，特警组的法西斯分子逃向太原。

榆次特警组的组织系统有正副组长各一人，为一级组长，一级副组长，组员八人。下设总务、文书、侦缉、审讯、营情五股，（均设股长）为五级，习艺所感训队，特工组各一，（设主任、副主任分三个队，设教导员）、下属有直属机关站（设站长及小组长多人）和二至五区四个分站，十八乡。

1947年6月，榆次特警组一级组长由榆晋区专署县长韩晋材的亲

信帮凶刘彪接任，并兼任习艺所感训队主任，此人系临汾人，时年24岁，是阎锡山特工系统中的职业特务，为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科员，受过阎第二十八期洪炉训，在充当榆次特警组长时，不受行政掣肘，凶残至极，奉行阎锡山“肃清伪装净白阵营”“以伪肃伪，政治救护”方针，以“断归路、辟前途，没关系、找关系，找下关系交关系”的办法，以利诱、欺骗、拉拢、威胁的手段，以处死严刑毒打来恐吓，使自首的人起到特务工作效用，不仅在行政人员中实行特务统治，还通过“政治细胞”与“特工组织”在特务中间互相监视，对思想动摇、态度暧昧的人，由政治细胞密报后拘禁，有的遭到惨杀。这个特务组织无空不入地在榆次的机关、厂矿、学校、城市、商号、街巷和乡村广大群众中秘密发展了二百余名特务细胞，建立情报站、组。组成了严密的特务网，搞监视、密报勾当。

特警组武装特务还向八路军根据地和边沿地区村干部和群众突袭，捕捉抢掠。曾在王香村打死民兵二人，1947年农历4月，特警组在小东关将井峪农会主席，东祁工会主任石糟头民兵等四人用刺刀刺死。将武工队长张全生等五人送太原特警处。

1947年冬至1948年春，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阎锡山为维持其即将灭亡的血腥统治，开始了残酷镇压人民的“三自传训”，榆次特警组加强了迫害残杀人民的罪恶活动，为了与各部门联系，榆次县设立“政救会议”，由特警组提出扣捕人的名单，由特警组长、同志会分会主任，国民兵团团长，警察局长等人出席会议，部队派人列席，县长韩晋材为政救会议主席，扣捕、处死或交警宪处都由特警组决定。先后扣捕过一千余人。仅在榆次解放前的一年

时间内，即扣捕我干部群众四百多人，破坏村支部二十六个。根据省特宪处规定，党员以上送“特种警宪指挥处”。在三自传训中，特警组长刘彪卖力讲述肃伪技术，亲拟自白人员管理方案，亲自逮捕二十多人，直接杀害七人，交乡村处死三十余人，受严刑及饥饿迫害死在监狱的五十人，差不多每天从特警组往出抬死人，送省“特种警宪指挥处”被杀害或下落不明的有一百五十余人。送阎军中当炮灰的一百三十多人，在特警组培植下而当特务者五十余人，释放回村强迫当特务的有四百余人。特警组在榆次人们心目中如同地狱阎王殿，一旦被捉进去不被杀害，也被折磨死，如上戈村的郑富英、侯来科、侯全柱、曹为儿，小壁村的张全全都是被押死在监狱的。特警组在刑讯逼供中手段残忍，打耳光，绳吊，坐老虎凳，灌凉水，钉竹签，残杀手段是刀砍、刺刀捅、枪杀。到1948年7月18日夜这伙杀人不断眼的刽子手枪慌亡命太原时，特警组里还留下扣押的群众七十多人。

1949年春，北京和平解放，解放大军云集太原城郊，而榆次特警组成员仍在建立单线特务细胞，并拟紧急时期“细胞”过滤办法，审查被裹胁去太原的榆次行政人员，由梁化之唆使，展开疯狂大屠杀，被捕杀的有榆次县秘书赵云山，王香乡长程文彦数人。但在其死期已近于太原解放之时，这个反动特务组织乃告崩溃，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特警组一伙都落网，刘彪与其主子韩晋材于1950年10月19日被押赴刑场处决。

郑景云整理

附一：

“兵农合一”给郭家堡带来的灾难

郭家堡村，当时有四百多户，一千五百来人，一半是外乡落户到此的，大多是河北人，并不间断的遣来，自从编组征兵、抓丁后，外乡人到郭家堡谋生者就断踪绝迹了，来落户的外乡人跑回了原籍，已落户的外乡青年也纷纷逃回了原籍，当地青年为了躲避当兵，背井离乡到外地避难，有的断指造成终身残废。郭来虎的父亲为阎锡山修碉堡将腿折断，家里只剩下他唯一的生活支柱，被恶狼似的带兵人拳打脚踢，绳缚到乡公所，关了七天禁闭，当了兵，赵柱满（木匠）的徒弟×保林被抓了路丁。后来，只要看到身体稍壮的人，不论年纪大小一起抓去当兵。随着，阎锡山的抽兵抓丁越来越多，种地的人越来越少，土地大面积荒芜。解放榆次前夕，城郊附近村的国民兵，统统被强迫上了城墙上的工事，仅郭家堡被迫而来的就有一百多人，其中不少是四、五十岁的人。

另一个灾难是要粮、抢粮。人们交不起粮，就受逼，遭毒打。段二满被打的死去活来，熬煎不过，跳井身亡，又逼得他儿子段根栋也跳了井，被发觉后，经抢救才幸存。赵柱满弟兄两人是木匠，村公所逼住他俩做打人的板子，有一次板子被打断，将他二人吊在大梁上毒打了一顿，后来他俩做成板子，就先从他二人身上试打，是否坚硬。老百姓除挨毒打外，还要赤膝跪地，地上铺黄豆，两手举砖，一旦东倒西歪，便被狠命脚踢。边海罗、李殿元等多次受过这

种酷刑。逼不出粮，就强迫天天应苦差。即是有点粮的户，因逼粮完没了，不敢一次把仅有的那点粮食拿出来，采取今一斗明五升软抗。有粮没粮，天天逼粮。逼粮往往在晚上，郭家堡流传着：“天黑村公所一敲钟，吓得人们胆颤心又惊，拳打脚踢板子楞，逼着二满父子跳了井。”一面逼粮，另方面还要挨门逐户搜粮，家家户户的米面瓦罐被折腾的底朝天，人们靠吃糠咽菜渡日，树木，即是春夏旺长季，也是光秃秃的，因为树叶被人们采净充饥了。好多人因吃糠，拉不下粪便，用铁丝从肛门往外钩，年老体弱有病的人和幼年儿童因饥饿而死的很多。

赵有勋搜集整理

附二：

“三自传训”血染榆次教育界

榆次教育界的“三自传训”，是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开始。那次，在太原市府东街省训团，搞的“自白斗争转生”训练，是晋中各县的教育科长、县督学、中心学校校长，中心校领导组长，及指定的国民学校校长，榆次县赴省受训的二十人中，有郭映垣自刎三刀，重伤未死。常书春坠石自击来中而神精错乱，范子荣、王嘉寿被刑伤，杨宜春、王启明至今下落不明。

一九四八年七月，榆次县教育界“三自传训”开始，各中学配备了特派员，整个把省里那一套照搬在榆次中、小学教员身上。在

这场浩劫中，有自杀的，有半死不活的，有神经错乱的，打成重伤的有白玉忠，折磨而死的有武润庭，仅官方发表就有百多人含冤而死。

传训的办法是用集训方法，每组设组长一人，斗争先锋一人。开会进入了斗争阶段时，先由斗争先锋开始捏造事实，以莫须有的罪名向你开展斗争，本组其他的人也同样的向你群起进攻，不是说你是共产党员，就是说你是捏任过通讯工作。边斗边打，这个踢一下，那个骂几句。一个组有十五个人，人人都得上手，手足交加，唾骂不止，弄得你昏头昏脑，欲哭无泪，逼得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意志薄弱胆小怕事的人，为了避免挨打受气，大半是以无作有，以假作真，承认自己是“伪装”，这叫做“围攻式的约谈。”

你承认了以后，组长便把你叫到另一个屋子，让你老实自白出来，好定你的罪状，这叫“拣豆式的过滤”。本组的人谁不忍向被攻者打骂，谁就是“伪装”，谁打的狠骂的绝谁就是斗争英雄。这样轮番的围攻，得不到预定的结果绝不停止。如果他们认为你自白的不彻底，在继续斗争时，各种酷刑就会加到你身上，常常是在半夜里打的哭声撕裂人心，叫声阴森凄残，稍有人心的人，无不痛心落泪，而这些狂疯之徒反兴高采烈的施他的威风。挨斗的人，有的四天四夜不能睡觉吃饭。参训的教育界人员在肉体惩罚上的酷刑有：1、烧红火柱烙烫。2、指甲中下竹签，3、颈手脚索捆在一起立着；4、两手捧冰跪在雪地上；5、乱棍毒打；6、人格的侮辱：唾骂、画眼圈子、戴纸帽子、屁股上插扫帚（说是九尾狐狸精）。

训练的过程是：第一日填自述表，约谈。第二日圈择问题答案，拿这圈定的结果做根据，确定斗争的对象。多数圈错和完全圈对的，都是引起注意的人，从此在班内就发动自白。第三日，在全

体课堂上，由他们预先布置好的参训人员（奋斗团团员）指出展开自白动员大会的要求，自选班救护员（救护政治错误的意，亦就是用假民主手段产生出执行自白斗争的领导人），制定不自白、假自白、自白不彻底、自白后二次活动者，均以乱棍处死的死律。并置备木棍（定名为慈悲棍），选出执棍人，在自白动员会上，把木棍排列会场四周，并在班内对每一参训人员（他们认为忠贞的干部不算）都用威吓强迫的方法指为有政治问题，所以那时人人自危，心惊肉跳，面容变色。自白开始后，预先把各班经受过威吓欺哄的人叫出来（不站出去处死，站出去管保无事），有三分之一的人数站出来自白，接着又一阵呼喊嚣叫，推拉拖添成了五分之二的数目。从此停课专做斗争，参训人员便开始了地狱生活。他们所用的这些方法，名目繁多，“围攻式的约谈”，“轮战式的警告”，“拣豆式的过滤”“盯哨式的监视”。他们预先布置假装参训的人员（打手），除对你打耳光、拳打、足踢、擂木棒外，还要将你上身衣服脱光，长时间高举双臂膀，头顶砖头跪在铁条上，然后用红火柱在身上乱烫；并叫你跪下起来，起来跪下，进行折磨。其他如熬夜断食等，就算是温和一点的手下留情了。至于画鬼脸扮狐狸比较起来更不算什么了。在这种残暴的情形下，不只是被斗者伤痕满身，鲜血直流，神经错乱，不死也得脱几层皮。就是尚未被斗者也都胆战心惊。有的吓瘫了，有的抖抖撒撒的不成人样了。因此有些受不过煎熬的便自杀以减痛苦。自杀的人那一班都有。自杀的方式有碰壁、上吊、跳井、自刎、吞金、吞镇静片（鸦片）等。如果你宁死不承认是共产党，有组织关系，就横遭这样的酷刑。如果你承认有组织关系，你说是党员，他们说你是县委、区委、村支部书记

若不承认便要加倍受重刑，压杠、支砖、夹指、灌水等。有的被送进本县特警组，有的送太原警宪指挥处，关进本笼，（日寇用时每笼一个人，而他们是每笼六个人，只能昼夜对膝而坐）。直至现在提起参训的事来，每个人禁不住要心跳哩！“三自传训”疯狂残酷乱棍打人逼人死命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

市史志编办梁秀梅整理

附三：

榆次农民受盘剥的几例

榆次解放前，农村封建势力十分顽固，只占农村总人口的6%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县耕地面积的60%，而占总人口94%的广大劳动人民，只有40%的土地，农民少地无地，租种地主土地，辛勤一年，所剩无几，难以糊口。张庆村（现属张庆乡）农民牛八娃租种地主二十亩地，五年共收粮食二百多担，本人只落下七担。阎锡山的“兵农合一”摧毁了农村经济体系，更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地主阶级和阎锡山的军政人员勾结在一起，把持了村乡政权，剥削、压榨、欺侮老百姓十分猖獗。他们向农民派粮派款时，层层加码，趁机敲榨，如：一九四六年，阎锡山政权向庄子村（现属庄子乡）派款八千元，已将农民手中的钱粮搜刮干净，无力负担了，地主村长又把派款增加到两万元，宣布：凡出不起粮和款的农民，把长在地里的青苗，低价卖给地主，以抵派款：连青苗也没有的户，派款